

摄影



入口, 2013年, 灯箱, 100cm x 125cm x 12.5cm。

## 陈维 忘我

撰文 唐凌洁 Lingjie Tang

迪斯科永远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。年轻艺术家陈维创作了一系列以迪斯科舞厅为题材的摄影作品，而近期为 Max Mara “经典的变奏” 展览拍摄灯箱作品，同以舞厅为背景。陈维以“忘我”形容舞池中人们的状态，画面隐藏着对于集体无意识的悲观理解。这出于他自小的反权威的个性，也来自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冲突……

42

该如何描述一代中国人的迪斯科记忆呢？

一些人会说，迪斯科是一个空间，是北京工体附近曾经项背相望、门庭若市的滚石，Babyface，Nightman，NASA 俱乐部，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频闪灯，不断重复的 4/4 拍，大汗淋漓的潮热舞池……

一些人会说，迪斯科是一个事件，是 1996 年来自深圳的 Michael Neebing 与香港电音厂牌 Technasia 联合举办的亚洲国际音乐节，是 1997 年长城上举行的第一次锐舞派对，是国际大牌 DJ 的悉数到访，一系列音乐派对组织（芥末声音、Acupuncture Records、Cheese、中国打气工厂）的建立……

然而在更多年轻人——比如 80 后艺术家陈维——的记忆里，有关迪斯科的画面是迷幻的、混沌的、碎片化的。那是一种冲动，跳舞跳舞跳舞，隔开所有的一切，只剩下身体和节拍。用陈维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没有办法去描绘一个舞厅的清晰轮廓，大家对舞厅是没有一个具体、直观的认识的，记得的只有灯光、气氛、冒着烟和人流汗的状态。”

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创作了一系列以迪斯科舞厅为题材的摄影作品，并将它们带去了首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“艺术探新”单元。在近期为 Max Mara “经典的变奏” 展览拍摄灯箱作品时，他又再次选择以舞厅为背景，在人流熙攘的购物中心二层，灯箱广告内一个身着大衣、面目清秀的年轻男子站在舞池台阶上，目光坚定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他所身处的空间，有着倾斜的墙壁、潮湿的地面、破碎的玻璃，像是纵情享乐的人群才刚散去。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，出现在陈维画面中的舞厅只有空间，或只有人。他们被隔离开来，没

# LEO XU PROJECTS

有互动，面无表情，完全沉溺于“忘我”的状态中。

对于这位来自浙江南部小县城的年轻艺术家来说，舞厅带给他的感受，更多是象征性的，穿插着时间和空间的想象。陈维的父母长年在外经商，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温州市区的小姨家度过的，小姨是一名钢琴老师。当所有同龄的孩子们还在为读书烦恼时，他回去补习功课为幌子，跟街坊邻居的小混混们去滑旱冰，打台球，初中的时候去跳迪斯科，唱卡拉 OK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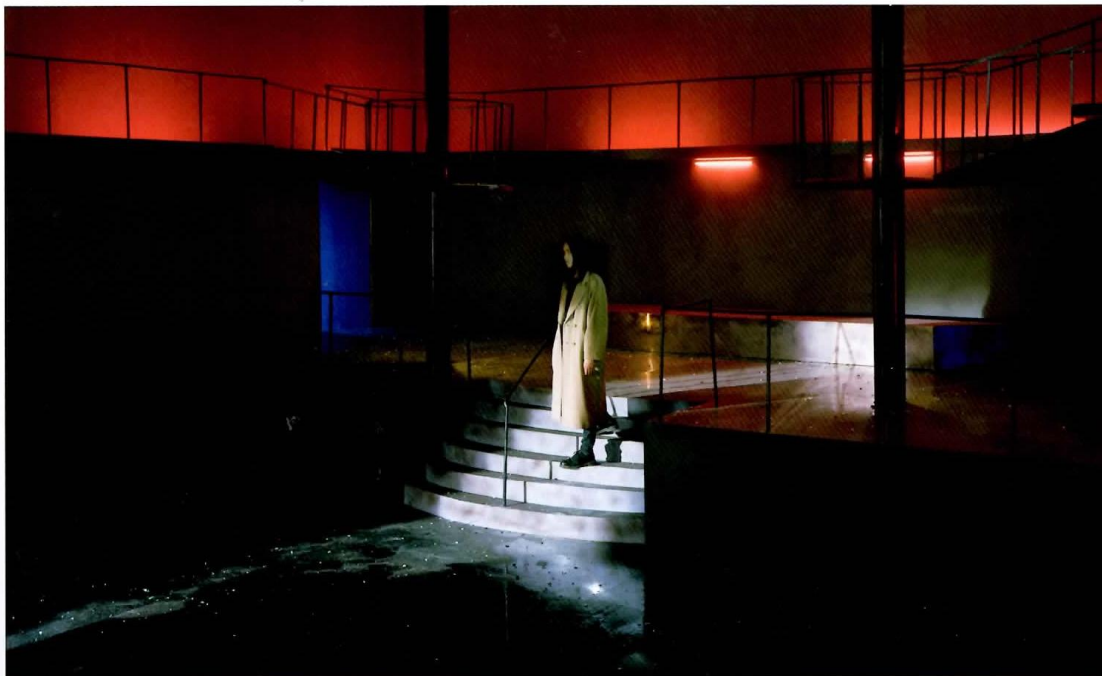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温州青年亚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，追赶着上海、广州这样的沿海一线城市，时间上的滞后，唤起了温州人对时髦之物的强烈渴望。小时候，陈维对上海的印象，来自于经常去上海出差的父亲和电影中梳着油头、喝着咖啡的上海男人。他记得那时，温州所有的理发店都叫“广州发廊”。每个孩子都想攒钱买一双昂贵的带钩儿的运动鞋。迪斯科舞厅并不只有蹦迪的人们，还兼具交友舞厅、旱冰场和游戏厅的功能，播放着新潮的西方电音和中国流行歌曲。

作为空间的舞厅，亦是离奇的，带有福柯笔下所描述的“异托邦”式的悖论。“人们去舞厅，是要去寻找某一样东西，”陈维说，“这些东西必须是远离朝九晚五的基本生活方式的。但哪个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呢？”他很喜欢用“忘我”这个词，将蹦迪的“忘我”状态定义为“带有目的性的自我表演”。舞池内的人们聚集在一起，自发地、自愿地达到某种失控的状态。“什么是忘我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从字面的解释就是把自己忘掉，如果看得再大一些，只剩下一个集体的行为，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众的状态。”对集体无意识的悲观理解，令人想起近 100 年前大众心理研究中盛行的乌合之众理论。

事实上，这一想法来自于陈维反权威的个性。起初，他与学校、老师、父母对抗。他逃离自己生长的城市。并非美院科班出身的他，会选择走上职业艺术家的道路，亦是因为对他来说，艺术象征着自由的生活方式。成为艺术家意味着不必像同龄人那样上下班、西装革履，意味着成为自己，不受限制地表达。但现如今三十而立、已为人父的他，却又要开始学着接受“生活的本来面貌”。家庭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柴米油盐、食品安全、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，不得不接受艺术圈的游戏规则。“我一直觉得没有安全感。”身处这些矛盾关系中的他是这么说的。

就连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时，陈维再次陷入了规则和失控的焦虑中。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摆拍手法，舞厅是他搭起的布景，演员是他设计的物件。但是很快，他发现过程并非如自己想象中的那般简单。他站在台上，望着强光照射下乌压压的人群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群众演员强烈的表演欲望，时常令他哭笑不得。“后来的四天，我一直在做噩梦，梦里都是我在调动作，摆造型，太可怕了。”他苦笑着说。

这不就是舞厅的缩影吗？一个混杂着规则与失控、秩序与无常、真我与表演的矛盾体。是转型中的中国青年文化孕育了迪斯科热，正如同样经历着社会身份转型期的陈维。正如在电影《最后的迪斯科》(The Last Days of Disco, 1998) 的末尾，导演惠特·斯蒂尔曼借男主角 Josh (Matt Keeslar 饰演) 之口所感慨的那样：即使若干年后，它会被视作老土，被曲解、讥讽甚至完全遗忘，即使人们会因为那滑稽的涤纶外套、厚底鞋和摆着如此荒谬舞姿扭动的人群而捧腹，“迪斯科永远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。”



穿越舞厅，2013 年，灯箱，100cm x 125cm x 12.5cm。(选自 Max Mara “经典的变奏”展览)